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发展问题与对策分析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Museum Youth Education

赵 菁

Zhao Jing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内容提要: 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近日印发, 围绕博物馆资源与中小学教育教学的融合与长效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发展目标。近几年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取得长足发展, 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博物馆教育服务的供给无法满足学校需求, 博物馆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协同机制不完善,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没有实现全学段覆盖等问题。因此, 需要推进博物馆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博物馆内部、博物馆与学校、博物馆与社会力量、馆际合作这四个层面出发, 提升博物馆教育服务的供给数量和效能。

关键词: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 馆校合作 博物馆教育供给侧改革 研学 社会力量

Abstract: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Administration issued the *Opinions on Using Museum Resources to Develop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recently. The *Opinion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development goals around the integration of museum resources and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s. In recent years,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museum youth education, but in practice, there is still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museum education services;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etween museums and social forces is not harmonious; museum youth education has not covered the whole school period. Therefore, museums need to promote the structural supply side reform of museum education. From inside the museum, museums and schools, museums and social forces, between museums, these four aspects, increase museum education service supply quantity and efficiency.

Key Words: Museum youth education; museum-school cooperation; the supply side reform of museum education; research trip; social forces



2015年,国家文物局和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文教结合、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时隔五年,2020年9月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再次联合发布了《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特别强调推动博物馆教育资源与学校教育需求的有机衔接,更加明确教育主管部门、中小学校、文物部门与博物馆各自在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中的责任分工和具体要求,更加突出博物馆教育课程开发与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的互补和有机融合。《意见》发布之后,在教育界和博物馆界引发广泛热议。博物馆与学校深度融合,能否将丰富的博物馆资源有效转化为中小学教育教学资源?《意见》的出台能否破解当前博物馆教育对学校而言“有益而非必要”的尴尬境地?博物馆自身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改进达到博物馆教育服务的提质提效,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对《意见》的政策解读和分析

近年来,国家关于博物馆教育和研学旅行的政策发布逐渐密集,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指导意见》和《意见》。对比两份文件,可以看到从政策适用对象、文字表述和政策内容与方向层面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两份文件体现了博物馆教育政策的延续性。作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文物主管部门的教育部与国家文物局两次联合发文政策适用对象均为博物馆和学校,文件聚焦博物馆青少年教育与学校教育融合这一社会和行业热点问题上,不仅使博物馆教育的工作重点更加突出,同时也为事业规划一个可预期的发展空间,对博物馆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政策保障和引领作用。

第二,从两份文件看,国家对“馆校合作”政策推进力度不断加大。2014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完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功能试点”工作,馆校合作蓄势待发。在此情景下,《指导意见》2015年适时出台旨在敦促博物馆发掘青少年教育功能,鼓励博物馆教育资源

与学校资源融合。政策表述使用了“实现……有效衔接”“探索构建……”,说明馆校合作尚处在试点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摸索经验。经过5年的发展,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各地涌现出众多馆校合作优秀案例与实践方案。政策制定者准确把握博物馆教育发展大势和面临的新任务,2020年《意见》出台时在政策表述上随之发生变化:“进一步健全馆校合作机制,促进博物馆资源融入教育体系,提升中小学生学习博物馆纪念馆学习效果”,“进一步”“促进”“提升”等词语显示了政策推进力度的不断加强。

第三,五年来,馆校合作的措施更具体、目标更明确。对比两份文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意见》中对博物馆教育如何开展的目标规划更为明确,馆校合作实施过程中的要求也更为具体。《指导意见》中对博物馆加强青少年教育提出了5点要求,《意见》中列举出9个措施,要求更加明确和细致。《意见》针对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发展现状提出了新要求,文中所列举的“提升博物馆研学活动质量”“纳入课后服务内容”“强化优秀项目示范引领”三点要求均是首次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其中博物馆研学是这两年博物馆青少年教育领域的热点,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地方。《意见》直面痛点,不仅要求“开发一批立德启智、特色鲜明的博物馆研学精品线路和课程,构建博物馆研学资源网络,发挥实践育人作用”,还建议“博物馆研学活动要注重分龄设计”,根据每个阶段学生的学习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研学课程。

第四,五年来,管理主体职责清晰,经费、物资等保障更加明确。《意见》中明确了“各地教育、文物部门”是促进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深入发展的责任主体,要从经费、人员和物资等方面对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给予支持,同时要做好安全管理和考核评价。《意见》对博物馆也提出具体要求,不仅在场空间、设备设施、人员方面做好保障,在展陈设计和智慧博物馆建设中都要考虑青少年的教育需求。可以说,今后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的权重更加突出,对博物馆定级评估和绩效考评都将产生影响;博物馆资源的教育属性更加明确,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工作中的必选项目之一。



二、当前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遇到的瓶颈

《意见》的发布为新形势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可以预见在持续稳定的政策支持之下,馆校合作、博物馆研学等工作也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对照意见中的各项要求和任务目标,结合博物馆教育工作的现实问题,我们应看到博物馆教育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重重挑战,发展瓶颈亟须突破。

1. 博物馆教育服务的供给无法满足中小学校的需求

在博物馆面向全体中小學生开展常态化的博物馆教育活动中,博物馆教育服务的供给不足一直是影响博物馆教育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博物馆举办教育活动近26万次,比2017年同比增加30%。即便如此,由博物馆社教部门直接组织的教育活动在社会上仍属稀缺资源。《意见》强调博物馆向学校提供教育服务的常态化,如“鼓励小学在下午3点半课后时间开设校内博物馆系列课程”。面对社会和学校越来越强劲的需求,博物馆除了继续加大人员、空间场地和经费投入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外,还能否通过重组博物馆内部组织结构,形成以教育、文化传播为核心带动其他职能协同发展的博物馆新业务模式,值得大家思考。

2. 博物馆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协同机制不完善

随着文旅融合的加速,博物馆研学作为一种新型文化传播方式,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旅游市场新的增长点。据不完全数据统计,2018年研学旅行人数达到400万人次市场规模上百亿,随着3岁至16岁人群规模的增长,2019年以后研学旅行市场将继续扩大^[1]。作为重要的研学旅行首选地,目前博物馆研学旅行市场呈现出鱼龙混杂的局面,假期的博物馆更是经常出现“百团大战”。这两年关于社会机构和研学旅行团队因组织管理不到位,扰乱博物馆正常参观秩序的报道时时见诸报端;这些行为对展

品、人员安全也造成诸多隐患。全国大中小型博物馆纷纷出台管理办法,旨在规范社会团体有序在博物馆开展参观、教学活动,然而实际效果却是一言难尽。社会力量已经成为博物馆教育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博物馆如何规范管理、接纳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博物馆、学校和社会机构之间合作机制如何构建,需要广泛采纳各方意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3.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没有实现全学段覆盖

目前博物馆教育的受众以小学阶段学生为主,没有形成对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全面覆盖;而初高中开展馆校合作的形式多以一次性的博物馆实地考察为主,单一、简单的教学形式不能吸引初高中学生积极参与。北京市教委从2014年开始组织“四个一”活动,截止到2018年底,共有146万人次北京市中小学生参与其中^[2],但这样规模和力度的有组织的博物馆教育活动在全国其他省市并不普遍。全国博物馆也尚没有出现具有示范意义的初高中学段馆校合作开发博物馆资源的优秀案例。究其根源首先在于博物馆教育输出的内容与学校、学生的需求不能完全契合,在较大升学压力下,初高中学段的学校、家长和学生自然会把博物馆学习排到学校课程之后。其次,馆校合作中双方的定位还不够明确,表现为博物馆教育的特色不够突出,没有与学校教育形成差异化互补。最后,当前馆校合作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师生到馆参观阶段,忽略了参观前对博物馆资源的了解和参观后的系统梳理和总结。

三、促进博物馆资源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深入融合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博物馆而言,要满足广大观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作为供给侧一方的博物馆必须强化供给能力,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及服务质量。在馆校合作中,“以‘博物馆单方面规划设计——学校选用馆方提供的活动和项目’的方式为



主，学校更多扮演‘消费者’角色。这意味着博物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必须以学校师生等主要使用者的需求为导向。”^[3]博物馆需要与学校之间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了解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真正需求。为满足社会和学校不同层次、丰富多样的教育诉求，适应需求侧的变化，博物馆教育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在眉睫。结合《意见》发布，笔者认为推进博物馆教育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四个层面关系。

1. 重塑博物馆业务流程，破除博物馆教育的旧观念

社会教育部门是博物馆承担教育职责的首要责任部门，但是博物馆其他相关业务部门如展览、研究、收藏等部门同样需要承担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实际工作中，中国许多博物馆仍然延续传统博物馆的组织管理模式，重视物的研究、重展览轻教育。博物馆的展览、保管、研究等业务部门处于业务序列的顶端，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教育部门的地位在博物馆组织结构中仍处于次要地位。正如尹凯所言：“曾几何时，研究员和部门分工的组织结构一度在博物馆领域内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习以为常的研究员地位与角色、稳固而僵化的运作程序难以让公众声音进入到循规蹈矩的实务工作中。”^[4]

事实上，博物馆业务部门的划分是一种并列关系，“多与博物馆本体相联系，是博物馆本体能力的表达，博物馆常常具有多项功能，其相互关系是分离的，多为并置的，且没有孰轻孰重的层阶之分，没有孰先孰后次第关系”^[5]。当代博物馆的使命和担当，要求博物馆要从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的高度认真履行博物馆承担的社会教育责任，不断提升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如今，博物馆组织内部正在发生改变，趋向于改变原有业务划分碎片化、分散化的结构，重新审视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社會功能，通过建立“以观众为中心”的博物馆业务工作主轴，打通跨部门合作的壁垒，将藏品、展览、观众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同时博物馆也在寻求如何积极回应

公众需求，更好地达到博物馆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目的。

《意见》中明确提出：各地博物馆要坚持“展教并重”，策划适合中小学生的专题展览和教育活动，动员博物馆内各专业的专家学者等参与博物馆教育资源开发。接下来，博物馆需要统筹协调全馆业务工作，将教育作为博物馆的使命；将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作为博物馆各项业务的价值取向和行动目标，将教育从博物馆业务链条的终端前移到藏品研究、展览策划和设计布展中，让博物馆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都体现教育思维和设计，彰显博物馆教育的价值。从展览策划到展示，要为中小学教育教学留下足够的空间，为青少年的博物馆学习提供场景和平台；要重视青少年在博物馆的体验，为展览配置适合青少年的互动体验装置和对应的教育项目和课程。从课程开发到活动组织，要考虑青少年的兴趣特点和接受习惯，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为青少年提供量身定制的教育服务。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从2014年开始的“读城”互动体验展览项目就是专为青少年量身定制的，每个环节设计都重视青少年的参与，最大的亮点还在于邀请青少年参与展览策划和设计布展。展览采用项目制，除展览形式设计外其他人员均来自宣教部门，不仅在馆内形成了各部门之间人员的联动，实现了博物馆教育的阵地延伸，也充分把社会公众的声音和力量融入展览之中^[6]。

2. 加大师资交流和培训力度，激发教师的内驱力

在馆校合作的实践中，教师虽然不是决策者，但教师作为学校、学生、博物馆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他们开发和利用博物馆资源的能力以及对馆校合作的意愿是否强烈直接影响着馆校合作的质量和发展趋势。从目前馆校合作现状看，教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归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馆校合作中学生第一，教师第二。学生常常是馆校合作的起点和聚焦点，教师的需求常被忽略。第二，外部力量推动多，教师自主需求少。近几年，参与馆校合作的博物馆和学校数量不断增加，但这种发展的动因更多来自于外部压力驱使，教师自身



的内驱力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教师缺乏参与馆校合作的热情。第三,跨学科能力弱,文化积淀少。教师培养中多注重学科知识的培养,教师备课和教研时都是按照学科划分,知识被条块分割,教师的跨学科研究能力被弱化,教师利用博物馆资源进行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能力亟待加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这在博物馆教育中体现地更为具体。馆校合作对教师的文化素养有较高要求,需要教师提高传统文化素养,将素养内化于道德修养的精神上、外化于教育教学的行动中,才能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境界。第四,馆校合作时群体培训多,忽视了教师个体差异需求。现实中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教师培训多以群体性培训为主,局限于集体备课或学科活动等传统研修形式。面对全新的博物馆资源,需要改变教师培训方式和方法,使培训能与每一位教师个人的专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帮助教师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教师培训项目“博老师研习会”自2016年开始,已经正式纳入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的课程体系,教师参加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培训项目即可获取职业发展必修学分。上海自然博物馆对教师的调查问卷显示,能否满足教师和馆员的个人需求会直接影响培训实施的效率和效果^[7]。

根据《意见》要求,联合师资培养、加强博物馆教育人员与教师的合作交流已被提上议事日程,接下来可以从思想融合、人员融合、方法融合、过程融合、技术融合这五个维度入手,为教师赋能。具体来说,即馆校合作的思想理念必须统一;馆校合作中除建立正式的官方沟通渠道外,应鼓励双方人员建立非正式的个人沟通渠道,使交流更快捷有效;在教学方法上,把握不同学科与博物馆资源的融合点,开展跨学科融合教学,提倡博物馆资源和教学方法进学校课堂;馆校双方教育人员共同主导博物馆课程开发,互为补充。总之,只有当教师通过持续不断的专业发展培养了变革意识,具备了熟练应用博物馆资源的创新能力,馆校合作才能获得革新的原动力。

3. 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现合作共建共享

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如何完善、深入和丰富?需要“完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机制,强调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紧密结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来保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也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基本运行机制,可以说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大势所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公共文化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差异化、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引入社会机构可以有力补充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不足,满足人民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的愿望,不断增进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获得幸福感和成就感。在博物馆教育的语境下,无论是博物馆还是社会机构,两者提供的教育服务都是在为青少年走进博物馆学习创造条件、提供帮助。博物馆与社会机构在教育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具有合作的基础。同时,社会机构的市场敏锐度高、机制灵活、人才聚集效应显著,如果博物馆能有效借助社会机构这个“外脑”,将极大地促进博物馆教育工作形成“引入活水,激发活力”的良性循环。

以博物馆研学旅行为例,研学旅行即包含了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的传统要素,同时还包括“研学”特有的研究、学习、知识讲授等内容。所以博物馆研学旅行服务是一种综合性服务,从组织到实施涉及多个行业和服务主体,需要政府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学校、博物馆和旅行社(社会教育培训机构)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因为各主体的关注重点不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政府业务主管部门要起到统筹管理和监督指导的作用,学校和博物馆则要对内容和形式进行严格把控,确保研学活动的专业性、准确性及正确价值观的引导。社会机构要不断加强自身业务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加大教学研发的投入,提高师资教学水平,提升教学体验和教学效果。与此同时,各部门之间还需要突破现行行政管理机制的束缚和条块分割制约,形成多方互动的发展模式,联合构建一个统一的博物馆教育服务供给体系。

4. 扩展馆际合作渠道，提升博物馆教育资源使用效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出现了高速繁荣发展的局面。但从总体看，我国各地博物馆的发展并不均衡：一线城市拥有博物馆数量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历史文化厚重的城市博物馆数量较多，县域博物馆发展相对落后^[9]。中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博物馆教育领域同样突出：大型和知名博物馆的IP影响力持续扩大，开展教育活动和馆校合作时更容易吸引社会关注，更容易产生资源的聚集效应；一线城市博物馆教育资源丰厚，公众对博物馆认可度高，博物馆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更高、配套服务更加成熟；二线城市尤其是市县级城市的博物馆受制于资源、资金、人才、观念所限，博物馆教育发展缓慢，社会氛围还不能适应博物馆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

《意见》要求博物馆教育资源建设的均衡化、针对性和广覆盖缺一不可。解决博物馆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应加快博物馆教育资源数字化建设和资源共享，使一线城市和大型博物馆丰富的教育资源通过数字化转换和多媒体互动展示，不再局限于实体空间与实物，突破博物馆教育服务的时空和地域制约，让边远地区的学生也可以享受高质量的博物馆课程和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加强馆际

合作与交流，从单个博物馆开发和策划博物馆教育课程与活动，转变为组建区域性博物馆教育联盟或博物馆教育研发中心。例如2015年由四川博物院与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合作建立了四川省博物馆教育研究所，2016年陕西省组建了全国第一家博物馆教育联盟，2018年由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等29家国家级博物馆及相关文化单位组建了长三角博物馆教育联盟，通过“手拉手”的方式汇聚博物馆教育人才、优化博物馆教育资源配置，研发博物馆教育精品课程，既避免各博物馆之间教育课程开发的同质化，又促进不同规模博物馆之间的协同发展和整体提升。

四、结论

《意见》发布进一步明确了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育教学融合发展的政策导向。接下来，博物馆教育工作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坚持多样性、共享性、创新性为原则，根据博物馆自身特色和实际情况，积极推进博物馆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应学校需求，推进馆校合作的常态化和持续性；充分利用“文化+科技”打造功能齐全的智慧化数字博物馆，提升博物馆教育的有效供给；完善博物馆教育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机制，实现学校、博物馆、社会力量三方的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 [1] 景区营销实战派. 行业关注: 研学旅行市场有多大? 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EB/OL]. (2019-06-03) [2020-12-01]. http://www.sohu.com/a/318206423_653484.
-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调整“四个一”活动相关安排的通知[A]. 京教基一〔2018〕15号.
- [3] 郑奕. 馆校合作: 即便有好的初衷, 也可能以失败告终[N]. 光明日报, 2018-04-07(8).
- [4] 尹凯. 序[M]//彼特·萨米斯, 米米·麦克尔森. 以观众为中心: 博物馆的新实践.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i.
- [5] 宋向光. 博物馆基本业务意义及逻辑关系分析[J]. 中国博物馆, 2019(4): 35-40.
- [6] 杨丹丹. 思维导图视角下的博物馆教育理念和实践创新再探讨: 以首都博物馆“读城”项目为例[J]. 博物院, 2018(1): 131-136.
- [7] 刘楠, 唐智婷, 邓卓, 饶琳莉. 基于馆校合作的教师培训项目实践研究: 以上海自然博物馆“博老师研习会”为例[J]. 科学教育与博物馆, 2020(5): 320-326.
- [8] 李洪佳. 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条路径[EB/OL]. (2018-01-16) [2020-12-01]. https://theory.gmw.cn/2018-01/16/content_27364659.htm.
- [9] 王春法. 中国博物馆发展研究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22.